

河合洋尚編，《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百年的軌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90頁。

為了促進中日客家學者的交流，河合洋尚遂把11位學者的文章結集成《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百年的軌跡》（下稱《日本客家研究》）一書，勾勒出日本客家研究百年來的發展和變化，並以中文出版。關於何謂日本客家研究，河合洋尚於序言二開章明義說明，日本客家研究並不限於指日本學者之研究，只要是以日文發表的研究均可被納入日本客家研究的範疇內（頁13）。此定義大大擴闊了讀者對日本客家研究的解讀。

此著作以順時序的方式把日本客家研究分為五個階段：（1）戰前的萌芽階段；（2）二戰後到1980年代的客家研究；（3）1980至1990年代的客家社會文化研究；（4）20世紀末客家及客家文化意象的塑造；（5）跨世紀的後現代主義和族群建構論。從19世紀末寥寥可數的文獻至21世紀碩果累累的學術研究，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亦展示了日本學者對「客家」的認識由道聽塗說的「誤解」轉為批判性的認知。本書分為六部十章，每一章又分為三至六個小節不等，簡單地介紹日本客家研究每個階段的發展。

河合洋尚把日本客家研究發展放置於與中國和臺灣的關係中作討論，而且在最後一部分總結中日客家研究的動向大同小異，兩者皆是由「民系」的論述轉換至「族群」的論述（頁146）。第一部分以1930年代為分界線，解答了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什麼會關注客家人。根據書中的分析，日本人對「客家」的關注始於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中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臺灣隨即進入日治時期（頁4）。於是，臺灣本土的「客家」文獻便成為了日本政府認識「客家人」的基本材料。由於臺灣的文獻資料甚少提及「客家」一詞，所以日本政府一般稱他們為「客人」或「粵人」，而日本人對於「客家人」的理解也只限於把他們視為畬族、水上居民或少數民族，反映日本於1930年之前對客家人的「誤解」（頁9）。至於為什麼是1930年代呢？河合洋尚認為很大程度是基於歐美傳教士的論述和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於1930年代傳入日本（頁4）。羅氏之說統一了戰前日本客家研究的發展，因而興起了「中原說」（頁18）。羅氏創造客家民系一詞，以中原正統論和本質主義論述「客家」的源流歷史及特徵，把「客家」理解為由中原遷移至南方的漢族，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固定特徵。日本學者受到羅氏的中原正統論影響，開始以「客家是中原漢族」為基調作論述及介紹。

至於日本客家研究於戰後至1980年代的發展不外乎是對羅氏之說的繼承與批判，從而構成本書的第二部分。客家學興起數年後便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的客家研究隨即處於停滯狀態。直至1980年代，大陸政治局勢逐漸穩定及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客家研究才再次受到重視（頁38）。正於中國客家研究處於停滯的時期，中川學於1960年代開始從遺傳學的角度質疑羅氏之金科玉律，更提出客家的新課題：客家在東南亞的黃金貿易（頁47）。

自中川學對羅氏之說提出質疑後，橫田浩一和河合洋尚於第三部分的第四章分析日本的人類學及歷史學者如周達生、植松明石、渡邊欣雄和瀨川昌久等到臺灣和香港田野考察的成果，指出所謂的「客家文化」與現實不符的現象（頁53-54、58-61）。對於「客家文化」之想像與現實的距離，兼城系繪於第四部分作出更深入的討論，指出「客家」意象不只是屬於「客家獨有的文化」之現象（頁92）。第五部分的章節則套用多個人類學理論於客家研究的範疇當中進行討論，由「客家文化」的意象與現實的距離到客家文化的地域差異，進行批判性的審視，指出地域性的差異有時比族群性的差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審視的過程中，他們帶出數個客家研究方法及理論的發展：由本質主義到建構主義；由科學實證論到族群邊界論；由「無意識形態」至「有意識模式」，呈現了「客家文化」意象的建構過程。到20世紀末至今，「客家文化」的意象基於各種政治經濟需要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建構及強化。本書第五部分亦闡明國家政策與族群印象的關係，指出人們對客家的理解大多是在國家政策下被建構出來的。例如小林宏至在第九章，以建築學為切入點及以福建土樓為例，指出在中國政府的主導下，土樓由一般的民間住處轉化為「客家文化」的象徵，後來更成為世界教科文組織下的文化遺產（頁140）。

雖然本書的作者主要是歷史人類學學者，但是書中對日本客家研究的分析實為跨學科的研究。作者們以多角度解讀客家議題，由戰後的客家方言研究到現今的客家建築意象，巧妙地以語言學和建築學的視點說明日本客家學的發展。同時，跨學科的介紹不但為日本客家研究的發展提供嶄新的理解，而且促使其發展邁向多元化。

當提到日本客家研究的發展歷程時，基於地緣和政治因素，日本客家研究的分析不得不套用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客家研究作借鏡，亦不能與兩地的研究發展割裂開來，作個別的論述。河合洋尚和本書的其他作者傾向把日本客家研究的發展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發展扣上關係，並時而作出比較，從而突出日本客家研究的動態，構成一塊較完整又立體的拼圖。中華圈的客家學者

對日本客家研究的確所知甚少，即使有所認識也未有為其作出系統性分析，此書填補了日本客家研究一直被學界忽略的一塊，實為打開了中日客家學者交流之門。

縱然《日本客家研究》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但此著作在編排上乃有不足之處。本書涵蓋多位日本客家學者的文章，要編排得宜絕非易事。當編者以順時序的方式作編排時，無疑會受到時序上的制肘，使第七章至第九章跨世紀的客家研究方法與前面章節分析的客家研究出現時序上的重覆，甚至是時序混亂。第一章是由19世紀末說起，讀至第八章卻回到太平天國與客家的關係。第八章提及的「政策移民」語意模糊，全章亦欠缺時間說明（頁119）。另外，由於此書由不同作者的文章編輯而成，每篇文章的獨立性相對也較強，從而造成章節之間的聯繫性較弱，亦有欠連貫性。對於編排上的缺失有礙讀者理解日本客家研究的完整構圖。若讀者欠缺相關的背景知識，會難於掌握書中所析述的發展趨勢。

縱觀全書的篇章，大部分作者在分析某階段的客家研究時，均傾向於選取一至數位較具代表性的客家研究學者作介紹，章節之間亦各有論述，欠關聯性之餘亦使整體失焦。同時，《日本客家研究》一書似乎以描述為主，分析性方面較弱。書中多個章節都只限於道出在某個時期日本有甚麼客家研究和研究背後的原因，卻未能明確解釋每個階段的發展特色及各階段之間的延續及改變。臺灣客家研究學者曾建元，於2014年9月在臺灣《民報》發表一系列的「走訪客家專文」，精而簡地分析了不同時期的日本客家研究，明確指出每個階段的特徵。曾氏把日本客家研究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戰前：辨識客家；（2）戰後至1980年代：中原正統論的繼承與批判；（3）1990年代至今：客家再創生之研究。相比河合洋尚的分期及鋪排，筆者較傾向於接受曾氏的解說。

當閱讀書中各日本學者的客家研究介紹，筆者期待得知各家之言的不足之處。可是，本書大多只限於描述其研究大綱及貢獻，以間接透視日本研究的發展。此有欠批判性，同時亦模糊了本書的主題。以第二章「二戰」後客家方言研究的興起與發展為例，此篇章未能把戰後客家方言的研究定位於日本客家研究發展的討論中，而且讀來更似學者傳記。大部分篇幅以介紹橋本萬太郎為主，用近似傳記的方式介紹其人生平經歷及對客家方言研究的貢獻，此篇章似是橋本萬太郎的傳記多於是評析日本客家研究的發展，似乎偏離了本書的主題。此外，大島廣美把戰後的客家方言研究視為萌芽階段。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學者難以進入中國大陸，而又缺乏政府支持，要研究客

家方言更為困難。那麼，為什麼日本於戰後開始興起客家方言的研究呢？大島廣美在文中並沒有着眼於此重要問題，轉而介紹橋本萬太郎的個人經歷，亦未能把橋本萬太郎的經歷放置於日本戰後的大環境中解讀，與其歷史背景扣上關係，以分析客家研究於戰後日本發展的概況。

筆者認為戰後的日本客家研究由中川學挑戰羅氏的本質主義之說為始，至後來以人類學的建構主義解釋一般大眾理解的「客家意象」為終，這是一個由認為「客家」理所當然地具有某些文化習俗到批判性地對其作出質疑的過程。然而，當本書的作者們多次對其固有的「客家文化」意象提出質疑時，似乎都離不開討論想像與現實客家文化意象之差距。例如在第四章，作者橫田浩一和河合洋尚指出戰後日本學者到中國內地及臺灣田野考察的成果，描述他們看見「什麼」，從而展示出想像與現實客家文化意象之差距（頁52-63）。對於為什麼出現此差距卻欠缺解釋，其文章的分析限於解答看見「什麼」的問題，而未能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此外，本書出現一些文句不通的句子及錯字，例如韓停頓的英文名字應是 Huntington，而非 Hantington（頁12）。

總括而言，《日本客家研究》一書概括地介紹了日本客家研究的發展，對於希望了解日本客家研究的讀者而言，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入門書。

邱嘉露
嶺南大學歷史系